

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

赵守辉,张东波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637616)

摘要:在全球化趋势加快的今天,世界将以两种形式并存的特征愈加明显:即以国家为界的有形世界,以及由网络、资本、贸易、技术、服务、人口流动等连通而成的无形世界。这将更加强化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联结,使各国的相互依赖加深。全球化也衍生出更多、更复杂的跨国问题,语言规划首当其冲。在为民族语言的使用、规划和推广提供机会的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也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语言规划的传统定义及研究领域。本文从民族语言与全球化互动趋势出发,考察语言规划国际化这一新兴的语言规划和传播领域及其相关现象,旨在为未来语言规划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语言规划;国际组织;全球化;跨境语言;宏观

Tow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A New Arena for Language Diffusion and Competition

ZHAO Shouhui, ZHANG Dongbo

(Centre for Research in Pedagogy and Prac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7616)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highly complex process that has made an enormous impact on multidimensional aspects of human life, one salient aspect of which is linguistic life. While offering opportunity for national language's wider use and spread, globalization also brings pressure to the researcher to review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its research dom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language within the national border and borderless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an emerging area of language planning by drawing upon worldwide experiences in major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areas. It aims to provide a new dimension for both language planners and researchers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 words: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globalization; pluricentric language; macro

1. 引言

本文语言规划的国际化是指民族国家语言的跨境使用,特别是指国际机构及另一国家的语言政策对主权国家民族语言的影响。传统的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立足于某一国家内部的民族语言。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出现与更新以及全球化现象的加速,莫基于民族国家的语言规

划领域面临着新的格局,语言同经济和金融等社会现象一样,也构成全球化标志之一。21世纪必将成为一个多语的世界,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国家观念渐成特例。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语言规划中处处可见国际化的影子。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为我们考察语言的规划、传播和竞

* 致谢:感谢上海海事大学张治国教授在部分资料方面提供的帮助。

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这门学科自产生以来,一直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划,注重国家或官方力量自上而下(top-down)政策对语言生活的干预。近年来,采用后现代观点对过去所推崇的语言规划结果进行政策批评和分析成为一种发展迅速的研究范式。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拓展了语言传播研究的宏观视角,比较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如[6;16])都注重从具体领域调查语言在一些国际组织或全球化行为中的接受(acceptance)细节和基层行为。

Chua 和 Baldauf[6]认为语言规划参与者可以形成一个从国际到国家再到地方直至基层和个人的等级序列,处于序列不同层面的规划者所涉及的规划活动、利益和努力方向相互作用,既有基于共同利益的协调与合作,也不乏矛盾和冲突。Spolsky[16]追溯了语言管理在超国家层面的具体事例和历史经验,也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细节。他指出,威力强大的全球化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国家传统主权的削弱;国际组织在语言教育和使用方面自上而下的政策,对其成员国的作用尚多停留在理论上,对实际语言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

2. 语言规划国际化的主要课题

2.1 民族语言的国际推广与扩散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发生前,民族语言的国际推广基本局限在欧洲工业化国家,传播途径多为资本自由流动与扩张而导致的海外殖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传播,主要指英、法、德、西、意以及葡萄牙语等强国语言。其中英语在二战后地位的窜升尤为令人瞩目。全球化的出现与发展促进了民族国家的语言全球化扩散,特别是使一些新生经济体国家的语言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语言同教育和文化事业一样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代表,这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亚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除了二战后逐渐强势和国际化的日语,其他一些原本国际影响极为有限的亚洲语言,或因国际贸易的繁荣成为具有经

济价值的语言(如韩语/朝鲜语、泰语、越南语等),或出于反恐形势的新需要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语言(如阿拉伯语之于美国或印尼语之于澳大利亚)。以汉语为首的众多亚洲语言开始在语言传播的竞技场上奋起直追,其影响令人瞩目。汉语传播政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可以说,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民族语言传播的国际版图。民族语的国际传播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具体情形本文不容尽述。

2.2 跨境语言的形成及标准化问题

跨境语言(pluricentric language)的标准化问题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语言规划的国际化现象。跨境语言由曾为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贡献众多术语和概念的人类社会学家 Kloss Heinz 在其 1978 年的一部著作中最早提出,后又由 Michael Clyne 和 Ulrich Ammon 的推广而逐渐为人们所熟悉。继 2010 年 9 月在葡萄牙召开国际跨境语言学的首次大会,2011 年 7 月又在奥地利以纪念 Clyne 教授的名义召开了跨境语言非主流变体大会。广义而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跨境语言文字^①,主要是由殖民移民、地缘政治和宗教传播三种因素造成。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2.2.1 殖民及移民跨境语

英语是典型的殖民跨境语,殖民为其最初扩散的主要途径。英语的国际化研究以往多集中于英语作为二语或外语的教学问题,即 Kachru(12)所谓的第二、第三圈使用区。近年来对英语规范化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新范式:一是对地区性英语特色的认可,即标准多元化,出现了几家像 *World Englishes*、*Asian Englishes* 这样的期刊以及众多以 English 的复数形式为标题的著作。这些研究多主张基于社区的接受性标准,而不是非英即美的二元化标准;二是英语在某一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本地化

^① Michael Clyne[7]在《跨境语言:不同国家的不同标准》一书中讨论了世界上 16 种主要的跨境语言。

及其对本地语言形成的结构性影响等问题。由于英语高度全球化,其规范化问题的复杂程度早已超越普通的跨境语模式,成为语言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汉语在东南亚被广泛使用(以新加坡最为突出)代表了移民跨境语,类似的还有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库尔德语和依第绪语。

殖民化曾在历史上带来资金和人口流动,导致皮钦化和克里奥尔化语言的产生,现今的全球化进程则为语言的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课题,除了跨境语言的标准化和英语的国际化、地区化和本地化外,还包括两种特殊语言的出现,即全球语(Globalish,[5])及国际专业组织行业特殊语(见下文的相关讨论)。其中,英语地方变体极具活力,近年来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例如 Spanglish(流行于西班牙语国家的英语)、Manglish(融合了英语、马来语及汉语的马来式英语)以及 Chinglish(中式英语)等等。双语及三语^②交际已经被认可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在多元文化社会,对新移民来说语言甚至就是命运。在迫切渴望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亚洲国家,出现了一种过度强调英语的语言迁移(language shift)大跃进现象,其表现不仅是民间对英语的学习达到了近乎宗教化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甚至获得官方的鼓励和支持,更有成为国家行为者,例如前殖民地在教育领域恢复英文教学媒介语地位。在像中国这样历史上毫无英语背景的国家,近年来也有呼声,要求在部分高等教育领域引入英语作为媒介语,推行所谓的英语授课。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国家试图以英语为第二国语,强行推行英语必知(English-knowing)双语政策。亚洲地区除了日本在本世纪初曾有过正式动议[4],还有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③。甚至经济更欠发达的内陆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提出了推行双语的目标[1]。

虽然以往语言的国际传播最直接有力的现象莫过于殖民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拓展和管理过程中,对殖民地的语言政策并非都采取积极的推广或同化政策。事实

上,究竟西方强国推广宗主国语言的政策是同化还是保护,学者们一直存在着争议(如,[15])。

2.2.2 地缘政治跨境语

地缘政治跨境语指因相邻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而形成的跨境语。因地缘政治形成的跨境语在亚洲可以韩语-朝鲜语、马来语-印尼语、孟加拉语-印度孟加拉语(西孟加拉邦)等为代表。地缘政治跨境语常牵扯到方言与语言的划界问题。它最易受因政治因素而导致国家版图重组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使本已复杂敏感的一个国家内部语言问题一下子国际化了,已经倒塌的巴比伦塔又重新矗立起来。独联体内大部分新恢复的民族国家至今仍在为新兴国家的语言地位规划问题而努力,为语言国际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热点。但 Clyne[7]认为,就欧洲而言,政治力量对语言发展来说是离心与向心作用是共存的。他曾预言,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强,基于国家认同的语言分类会衍变为基于文化认同的语言分类。

2.2.3 宗教跨境语

宗教传播形成的跨境语不多,常表现在书写体系。周有光先生[22:153]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文字跟着宗教走。比如欧洲有一条字母分界线,从北向南贯穿于中欧和东欧之间。线西是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各民族,用拉丁字母;线东是希腊东正教各民族,用斯拉夫字母。世界上有限的书写系统记录了数量庞大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宗教的作用。例如,伊斯兰教的传播形成波斯文字区;东南亚泰、老、柬、缅等国的文字皆因佛教传播而发展自印度南方字母。宗教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可能仅次于种族,以至宗教的冲突常常表现为语言的冲突。巴基斯坦穆斯林对乌尔都语的认同导致国家分裂,斯里兰卡操僧伽罗语的佛教徒与操泰米尔语的印度

② 2+1模式,即,母语/地区语加国语再加国际语。

③ 如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堃于2003年2月4日宣布,未来6到10年内英语将可成为台湾的官方语言或准官方语言,行政院文件实行中英文对照[21]。

教徒之间的长期内战,都是语言、种族和宗教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宗教跨境语在下文宗教传播与语言规划关系一节会再次涉及。

2.3 跨境语的标准化问题

跨境语言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标准的确定和取舍,进而涉及语言与方言的区分,采用外生(exonormativity)还是内生(endonormativity)标准一直是语言跨境管理的核心问题。跨境语言标准化涉及语言本体及使用的各个方面,但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和正字法(orthography)方面(如德语为正字法的改革而专门成立跨国的德语国家协调委员会)。一般来说,殖民移民跨境语国家进行本体规划时常采用原生国的标准(外生标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可产生影响的因素几乎难以尽举。跨境语与认同和权力相关联,结果导致了其中心与边缘的层级性,像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这样的对称(symmetrical)跨境语极少。不过,这也反应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可以迁移的,如英语的中心地位从英国移到了美国,而荷兰语从佛兰德斯(Flanders,古地名,主要位于今天的比利时北部)移到了荷兰[7]。所以,Ammon[2]认为跨境语的中心可以是一个流动的连续体,他为此建立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模型,通过输入影响因子可得出四种跨境语类型:完全中心型、趋于完全中心型、准中心型和初级中心型。

3. 国际规划的若干领域

如前文所强调,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现象,几乎全部世界人口都在经历着全球化持续不断的影响。来自不同国家、文化、社区的人群突然如此大规模地相遇于不同场合,进行接触和交际,首先要面临沟通媒介的选择。早期全球性跨国组织的语言使用问题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成立,国际组织的语言使用问题逐渐突出。逮至近年来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范围和地区间的交往加强,依赖加深,这一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的语言使用问题可以从象征与现实两个层面来考察:

国际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组织及专业领域的合作组织。具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六大领域。其他方面,比如旅游观光、体育赛事等等,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论及。

3.1 国际及地缘合作组织

这是指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及稍后因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而建立的地区性组织。国际组织成立之初的首要考量之一就是语言选用,这不只是为了提高自身机构的管理效率,颁布法规政策等文件的语言使用更是一种外交博弈。大家一般接受以最少的语言(最好是一种)进行运作而同时使每个成员国的国语获得象征性的承认。这里只略讨论联合国及近一二十年来影响较大的欧盟和东盟。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语言问题正好可以代表三种主要的类型。

国际组织确立正式认可的官方或工作语言常常只限于形式上的规定,实际工作中往往英语一语独大。这种情况典型的就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如科教文组织)。众所周知,联合国规定有六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汉语),但是大部分官方文件实际上只有英语和法语文本,能够保证所有文件都可阅读的便只有英语了。联合国的语言问题今日仍在发展并时有争议。一方面,主张只使用英语的意见一直强大;另一方面,印地语也要求加入,而位列世界第七大语言(使用人口达2.3亿)的孟加拉语也希望成为联合国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则是抱怨其使用率太低。

东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类模式。其10个成员国中,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菲律宾等国是前英国或美国殖民地,印尼曾为荷兰殖民地,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曾为法国殖民地,泰国是唯一的未曾被正式殖民过的国家。东盟各国之间的语言生活堪称复杂。宗教方面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都在一国或多国作为国民的主要宗教,语言属系和文字都有较大差别。语言沟通性方面,只有泰国与老挝、柬埔寨可实现部分沟通,马来语与印尼语名异而实同。东盟

并没有正式文件对工作语言做相关规定,但为了沟通与交际的便利,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英语,包括越南和老挝这样的法语影响较强的国家也情愿使用英语。所以东盟的语言政策实际是约定俗成的,这种对英语的不言而喻的认同基础既是因为英语的强势作用,也是因为一部分国家与英语的历史渊源。值得强调的是,下段详述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发展的形态也可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文化传统与社会形态的作用,可以从情况更为复杂的另一大国际化组织欧盟的语言政策中略窥端倪。欧盟现有 27 个成员国,使用着 23 种官方语言,其中最有影响的成员国绝大多数是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即哈贝马斯所指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普遍认同多元与宽容价值观,关注少数和弱势群体。不过,对语言多元化理想的拥抱与追求高效的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使欧盟的语言政策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凡欧盟成员国的语言原则上平等,这种理论上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结果,就是欧盟备受争议的庞大翻译费用;另一方面是小语种的官方文件。很多情况下小语种国家的本国人亦倾向使用强势外语[17],而对内对外的交际真正使用的还是英语和法语(如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法院),偶尔使用德语(如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银行)。欧盟秘书处的办公语言实际也只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国家的代表使用英语或法语明显比本国语言更为得心应手。如爱尔兰代表中没有一个人是只能说爱尔兰语的单语者,还有的代表根本无法流利使用爱尔兰语。将爱尔兰语包括进来仍是一个象征性的重要考量,欧盟为此需要消耗 30 名笔译人员的费用。西班牙国内的地域性语言进入欧盟也是如此[16]。将人权观念扩展到到语言的管理是欧盟的一个根本性价值观,尽管造成如此大的经济负担,多元化仍是欧盟的基本政策和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并以此作为维护主权的象征,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Spolsky[16]指出,国际组织虽然无法跨越

主权,干涉成员国语言政策,但至少在两个领域可以影响到个别政府的语言政策,除了通过语言教育提高成员国之间的交际效率,还通过发表宣言、达成协议、颁布法案,与成员国取得共识,从宣传和道义层面促进语言多样性和实现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保护。欧盟对成员国公民学习各自语言的要求已经不只是唱唱高调,而是从宣传进入到具体实施,并正在真正影响着成员国的语言政策。此外还可借助法律途径,如欧盟所属的欧洲法院可以通过案件的裁决影响其成员国的语言使用和政策。

3.2 专业国际组织的语言问题

专业合作组织以加强国际合作为宗旨,旨在提高专业领域的效率并确保安全。例如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海员群体来自不同国家,上世纪 80 年代,撞船和搁浅事故和百分之七十五的船上火灾源自为事故,这给解决海上语言交际问题带来巨大压力,于是“海事英语”(亦称海事语 - Seaspeak)应运而生^④。专业组织的语言政策没有地缘因素的作用,一般也不会受到政治干扰。最为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的还有国际术语协会、纯化学及应用化学工会、国际动植物学术语委员会、位于英国的电气工程标准委员会、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等。其中一些组织对交际效率和准确性有特别要求,需要对语言进行干预、通过简化和规约产生一种特殊的语言,称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人们常常提起的包括警事语(Policespeak)和隧道语(Tunnelspeak)。前者需要沟通表达时词义达致最大限度的清晰和准确,而后者则更加特殊,操两种不同语言(英语与法语)的工作人员共同操纵高速强大的现代化交通,要求毫厘不爽的密切合作,为此双方合作,专门开发了将英语和法语都包括在内的专门词汇。成立于 1947 年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④ 国际海事组织(IMO, 1958)负责《标准航海用语表》(SMNV, 1977 年提出)的编制,该表收集了许多标准的英语短语和句子,简单明了。2001 年又在该表基础上制定了《标准海事通信用语》(SMCP),使得海事英语更加固定化和标准化。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 ICAO) 与国际航海组织类似,于2002年出台了语言管理政策,规定交际时必须首先使用已作规定的标准短语,只有在此规定不可满足时才可使用普通用语。ICAO 还于2007年颁布了语言水平测试的政策。一些更大规模的国际专业组织也采取联合国模式,即以多种国际语言为工作语言,但实际语言使用情况也未能改变以英语为主的状况。人们期待着国际专业机构在打破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3.3 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

高等教育中的语言选择对语言规划的影响作用是如何估计都不过分的。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具体现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是发达国家语言,特别是英语的教育出口事业高歌猛进,吸引了第三世界大量最优秀的年轻人,直接导致了势不可挡的外语/英语学习热情。这从亚洲国家经久不衰的英语补习产业和各种水平考试的强大吸引力中可以看出。在中国,“英语热”甚至严重冲击高等教育中母语的地位,曾经争议蜂起[19]。由于高等教育居于社会上行(upward social mobility)动因的最上游,这又直接导致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向外语一边倒的现象,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语言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压力与威胁。关于高等教育媒介语,有几种情况值得一说。一是有些前殖民地国家的一些科目一直努力采用母语教学,近年来有逐渐恢复高势语(high language,主要指英语)的趋势,例如印度和菲律宾,特别是马来西亚[10]。这种趋势实际上从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取消唯一一所华语区外的中文大学时就开始了。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实力较强的高等院校都试图在部分理工科目里采用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尽管迄今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师资力量不足)并未取得满意效果。最后,高等教育界加强英语影响力的表现是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走出去”的教育出口形式,即英语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联合

办学,这种新兴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模式堪称方兴未艾。当然,全球化是一个文化和语言的双向流动过程,外语学习也逆向改变了发达国家的语言教育图景,除了传统的欧洲语言,汉语、日语、阿拉伯语等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中的外语,特别受到社会和人文科学学习者的欢迎。但非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对英语国家语言生活的影响还主要限于高等教育,对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仍可谓微乎其微。

科学研究的全球化即是研究成果发表的英语转向过程,英语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无疑是与二战以来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强大科技实力密切相关的。上个世纪初,在科学研究界法语与德语同英语还有着几乎完全平等的地位[6]。今天,不但重要的科学研究倾向于以英文发表,非英语国家的一些重要科学期刊已经不限于只提供英文索引,发行英文版甚至完全转换为英文版也屡见不鲜,如德国近年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3]。科学技术常常成为一些国家重视英文的直接原因。新加坡以“母语为体,英语为用”为特色的双语教育政策,其重要根基之一就是英文之于贸易与科学技术的便利。科技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英语的国际化,结果是,几乎每个国家的语言规划者都要面对专业术语是直接采用英语还是翻译或另造新词/字的艰难抉择。

3.4 宗教活动

宗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宗教对语言的影响被一些学者(如,[16:31])看作是仅次于家庭的社会力量,但其与语言管理的特别关系直到近年来才受到重视。教堂、礼拜寺及清真寺是很多祖裔语言(heritage language)得以传承的关键场所。宗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其对古典语言的膜拜,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今,即使是对语言选用比较开明的基督新教、佛教等,也都有尽量使用古典语的倾向。

人们相信越古老的语言对教义传播的“保真性”越高。例如古拉丁语之于基督教,阿拉伯语之于伊斯兰教以及巴利文之于佛教。阿拉

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巴利语都是借宗教经文得以广泛传播。Fishman [9: 360]认为世界上四大古典宗教用语是希伯来语(旧约圣经)、阿拉姆语(Aramaic/Syriac, 耶稣的语言)、希腊语(新约圣经)和阿拉伯语(古兰经)。对语言使用最为执著的当属伊斯兰教,它虽然是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原则和信条基础之上,但语言方面却坚持只有古典阿拉伯语才能与神沟通,准确传达真主的教义而不允许翻译。其对语言的近乎原教旨型的坚持,一方面导致阿拉伯语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压迫当地土语的习得,成为导致穆斯林国家文盲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宗教的跨国特性使其对语言规划的影响具有极强的国际化特色。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只用阿拉伯语书写与传播,使伊斯兰教信徒或多或少能懂一些阿拉伯语。譬如中国包括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至少10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深受阿拉伯语影响。而基督教圣经及传教用语突破拉丁语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基督教宗教传播史上曾经存在过使用当地土著语文还是西方语文传播的两条路线之争。像南美洲的拉丁化和西班牙语的传播,传教士在官方语言政策制订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5]。

今天,现代三大世界性宗教除了伊斯兰教在语言使用方面略保守以外,基督教和佛教对于语言使用的本土化和世俗化都采取了务实政策,特别是基督教本来就是操多语者在多语环境中创立的,而且热衷于传教和皈依活动,自然就不大在意教义的语言使用,《圣经》已经被译成了2000多种语言。基督教的传播大规模采用西方现代语言是随着殖民地的拓展而开始的,这是导致宗教语言也逐渐英文文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英语在世俗世界独步天下的同时正在成为宗教的通用语,证明这个被 Philipson [13] 称作语言帝国主义过程中全世界语言的谋杀者的身影无所不在。

3.5 商贸与传媒

商业机构的多语模式古已有之,语言的经

济价值是语言规划领域的一个棘手问题,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是不可回避的。首先,即使不作正式要求,跨国公司的员工在自己的业务中也肯定会面对外语问题。贸易机构管理人员与下属之间、员工之间以及公司与客户之间时刻都要面对沟通手段的选择,而职场用语很容易成为人们外语学习的动力。其次,商业贸易还要与产品服务的对象与社会和社区互动,这又涉及到商品的名称、店牌名称、广告用语和产品说明等用语问题,成为近年兴起的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研究中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公司管理中与产品生产销售有关的语言事务虽然是一种纯商业行为,理论上国家无权规定私有企业的语言使用,但出于安全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考虑,绝大多数国家对产品与用户的这一交际界面的书面语实行管理,譬如新加坡和中国^⑤。跨国公司也出版具有语言规范作用的文件,如加拿大电力公司、魁北克水电,出于对电力系统的保护和监控的需要,也积极参与术语的统一活动[6]。

在国际语言规划学界,学者们一直试图建立商业活动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如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其工作用语(特别是跨国公司)以及广告用语究竟是多元化还是一元化更有利于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仍是一个有待取得共识的研究课题[11]。Feely 和 Harzing [8] 研究了公司语言管理的各种模式。在780家接受调查的国际公司中,有十分之一的公司承认自己制订有海外顾客的语言策略,同样数量的公司承认外语是自己招聘员工的一个考量因素。有的公司自己投资于语言培训,德国大众集团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其员工要参加共六个阶段的语言培训项目,每阶段都包括90个小时正规的课堂语言学习。

传媒全球化对语言传播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商品出口及其广告宣传,还包括娱乐性传媒的海外扩张。就亚洲而言,日本的卡通和电视剧

^⑤ 例如早在1959年中国就曾颁布过《国务院关于在出口商品的装潢和商标上使用文字的通知》。

文化曾借助传媒的力量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产生持久的影响。发生于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所谓的“粤语北上”,曾经在中国语言规划者间产生恐慌,除了珠江三角区领经济改革风气之先这个因素外,主要的推手就是粤语歌曲和电视剧。Zhao 和 Baldauf (18:195) 曾注意到宝莱坞 (Bollywood) 电影对印地语向印度全国的普及作用和泰国电视节目对泰语在老挝的传播作用。

本世纪初以来,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着全球性大流动,特别是贸易国际化与业务外迁 (outsourcing) 新模式的出现,语言随之传播是其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对语言使用来说,全球化商业活动结果仍然是加强了英语的国际化作用。但就传媒而言,学者们(如,6) 注意到了个很值得关注的趋势,他们指出由于因特网的作用,目前在虚拟空间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英语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一组强势网络语言之一,不过,如汉语这样的,在当今国际传媒中日趋重要的语言将来也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发展。Spolsky (16:86) 也曾指出,网络曾被认为是语言多元化的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上又加了一锤,但研究表明事实恰是相反:网络正在越来越多语化了。语言的技术障碍正在被打破,不但多文字系统兼容,还可以互译。现代传媒手段的全球化在众多弱势语言向全世界表达自己和传播文化提供了窗口。

3.6 军事与安全

就个体国家的语言规划而言,学者们发现兵营在传播标准语方面有着极其特殊和不可替代的作用(16:215)。在多语国家新加坡,兵营不仅是英语使用的主要场所,而且还是福建方言(特别是俚语)和马来语(阅兵口令)的一个传播和保留地。以色列军队士兵是来自世界的犹太青年,成为传播希伯来语的一个最有效的场所。

军队因国际化而产生的语言问题由来已久。国际反恐合作催生军事的全球化,主要体现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及军事情报的获取与共享等方面。原则上,如果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事机构或队伍的军事人员来自不同国家,指挥官应该至少会讲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但雇佣翻译仍常常是必须的。例如,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维和人员使用的语言通常只有汉语普通话,在语言交际方面常碰到困难(20)。目前,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语言规划项目,英国政府积极资助“英语协会维和英语项目”(British Council Peacekeeping English Project – PEP)中的活动,参与这个项目的还有加拿大、匈牙利、荷兰及挪威等国。通过提供英语课程,培训军事人员。多年来,该项目在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协调能力与沟通效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促进了参与国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与此项目相配套的标准化的“维和专用军事英语水平测试”(International Testers of English for the Military Group – ITEM)也已开发完成,意味着英语将成为国际维和行动的绝对优势语言,英国政府在这一重要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扮演了显性规划(overt planning)的角色。

引人深思的是,军事目的一方面加强了英语的全球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迫使英语单语国家的军事和情报人员更加双语化和多语化。Pratt[14]相信,全球反恐的需要迫使美国结束一直以来的单语政策,公众和教育部门都认识到理解其他文化和语言的必要性。这促使美国采取了一种与英国政府相反的策略,英国借此输出英语,而美国政府的介入则体现在对外语学习的加强上,特别是确定了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价值的所谓“战略语言”的教学和培训,建立了鼓励军人外语学习的特别基金。众所周知,美国在二战期间曾大胆利用敌国(德日)侨民语言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急迫的外语人才短缺问题。但在本世纪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国防部承认,与语言相关的情报方面多有失败,急需引起注意并制订补救措施。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发起了国家语言安全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 NSLI),预算一亿一千四百万美元,但这笔钱和用于伊

拉克和阿富汗一个五年翻译合同的四十六亿五千万美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足见基于军事目的的语言规划对国家语言政策制订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4. 结语

近年来学者们认识到语言规划的局限,对语言规划的微观方面和声誉规划 (prestige planning) 产生浓厚兴趣,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基层作用。特别是在后现代特征浓厚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受福柯微观权力观 (governmentality) 启迪,权力作为艺术和技术,强调其柔性、无所不在的真实作用,体现在对个体的实际控制能力及真正左右个体行为的是复杂的权力运作方式。像语言使用这样的人类行为远非国家机器所能真正武断控制。语言规划中微观规划渐受重视,侧重具体领域如家庭、学校、法院、健康医疗、商业的语言使用,研究视野不断拓展。随着世界全球化的深入,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的无国境化,信息和人口的加速流动,语言问题也愈趋国际化或地区化。语言规划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促使人们对国家、民族、语言和主权等概念进行新的思考。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它对经济、政治、传媒等领域的影响早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不过其对语言规划的冲击作用近几年才被学者所重视。

全球化被定义为技术、人口、思想、形象等不可预测性的快速流动。这种流动既是向心的又是离心的,同质化和异质化作用并存。一方面国际化趋势最直接和明显的表现就是英语独步天下局面的加强,但与此同时也再一次为语言多元化提供了机遇。特别是若干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纷纷借此机会大力推动自己民族语言的国际化。中国、印度等新崛起国家走上世界舞台,逐步参与主宰国际事物,要求增加相应话语权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国际合作与交往的频繁前所未有。汉语是极少数可以对英语全球同质化和单一化构成严肃挑战的语言之一。另一方面,以往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国际组织来承

担责任和义务,今天以全球化视野来处理语言问题的国际组织增加很快,对语言规划具有隐性或显性影响的组织越来越多。国际化的另一个隐含义就是标准化,信息交流和货物流通突破一国一地,语言规划向国际领域延伸,无疆界趋势日益明显,民族语语言标准的制订也有必要增强国际化意识。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国对内、对外语言规划政策的制订无疑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的语言规划范围逐渐扩大,已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现代化的范畴,近年来母语和外语教育、民族地区的双语政策以及汉语的国际传播等领域不但规划活动趋向活跃,视野也愈加广阔。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本文所论述的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能为上述几大语言战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考量因素。

参考文献:

- [1] Albey, M. *The prodigal tongue: Dispatches from the future of English* [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2008.
- [2] Ammon, U. Toward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status/function/social position of a language within a country [A]. U. Ammon. *Status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s and Language Varieties* [C]. Berlin: De Gruyter, 1989. 21 - 106.
- [3] Ammon, U. Language planning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 overview of question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6, (1): 1 - 31.
- [4] Baldauf, R. B. Jr. & Kaplan, R. B. Language policy decision and power: Who are the actors [A]? P. M. Ryan & R. Terborg. *Language: Issues of Inequality* [C].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2003. 19 - 39.
- [5] Brutt-griffler, J. *World English: A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2.
- [6] Chua, S. K. C. & Baldauf, R. B. Jr. Global language: [De]colo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 E. Hinkel.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2nd ed.) [C].

- London: Routledge, 2010. 952 – 969.
- [7] Clyne, M. G. *Pluricentric languages: Differing norms in different nations* [C]. The Hague: Mouton De Gruyter, 1992.
- [8] Feely, A. & Harzing, A. W. Language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 (2): 37 – 52.
- [9] Fishman, J. A.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 [10] Gill, S. K. Nambiar, R. M. K., Ibrahim, & Tan. K. H.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shift in Malaysia: Challenges of implementation [A]. V. Vaish. *Glob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Asia* [C]. New York/London: Continuum, 2010. 180 – 205.
- [11] Grin, 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Policy [A]. T. Ricen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C].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77 – 94.
- [12] Kachru, B. B.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A]. R. Quirk & H. Widdowson.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 36.
- [13] Philipson, 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4] Pratt, M. L.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king a new public commitment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4, (2): 289 – 291.
- [15] Sánchez, A. & Dueñas, M.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2, (3): 280 – 305.
- [16] Spolsky, B. *Language management* [M].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7] van Els, T. Multilingu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5, (3): 263 – 281.
- [18] Zhao, S. H. & Baldauf, R. B. Jr. *Planning Chinese Characters: Evolution, revolution or reaction* [M].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8.
- [19] 贺阳. 高校母语教育亟待加强—基于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调查分析[Z]. 光明日报理论版, 2011年01月11日, 第15版.
- [20] 李洪乾. 中国军事维和人员外语技能培养现状及其途径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09, (2): 38 – 40.
- [21] 许长安. 台湾的语文政策及其论争[J]. 现代语文(理论研究), 2006, (4): 28 – 32.
- [22] 周有光.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基金项目: 本文获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国语言文字战略研究”的资助, 项目号: 10JZD0043。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赵守辉(1963 –), 男, 吉林长春人, 研究员, 博士。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化教育, 汉字现代化, 语言政策及新加坡华文教育。

张东波(1978 –), 男, 安徽合肥人, 研究员, 博士。研究方向: 第二语言习得与教育、双语研究、心理语言学。